DOI: 10.13718/j.cnki.xdzk.2018.02.016

重庆市县域乡村类型划分及格局特征
——基于乡村发展水平和转型评价①

郑祖艺[1,2]，　廖和平[1,2]，　杨　伟[3]，　赵振洋[1]

1.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400715；2. 西南大学 国土资源研究所，重庆 400715；
3.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地质与测绘工程学院，重庆 400037

摘要：2005 年以来，我国乡村进入迅速发展并逐步转型阶段，为明确重庆市乡村发展阶段、划分乡村转型发展类型、刻画乡村转型空间格局，通过建立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和转型类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断裂法、系统聚类法等方法，将重庆市乡村聚类为 6 个乡村转型综合类型区. 结果显示，2004－2015 年重庆市总体乡村发展差异明显，两极化较严重，但统筹城乡等措施已初见成效，乡村自身发展动力得到明显增长；类型区呈现出一定空间分异规律：乡村发展水平由都市区至“两翼”地区逐步降低，都市区外围区县发展迅速；转型类型由距都市区向外呈圈层结构，由近及远表现为“以城带乡－城乡协调－以城带乡转型”. 并针对不同类型区分析其发展特征和转型路径，提出乡村发展措施建议.

关　键　词：乡村发展水平；乡村转型发展；类型划分；空间格局；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868(2018)02－0104－09

我国幅员广阔，农村发展地域差异悬殊，不仅农村经济发展基础与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地带性和地区差异性，其发展进程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主体性差别[1]. 因此明确乡村发展阶段、刻画乡村转型发展类型、探索不同尺度下乡村转型空间格局、剖析不同发展类型对农村发展的主导驱动力等成为当前我国乡村地理学者创新研究的重要方向与研究领域[1－2].

我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主要涉及乡村转型发展的实质[3]、转型方面[4]、具体指向[5]等乡村转型发展内涵研究；从“人口－土地－产业”[6]、体制转换[7]、转型与协调[8]等不同视角对发展类型与地域模式研究到乡村发展驱动机制[9－12]、影响因素[13－14]、过程格局[15－16]的研究. 划分方法上，多采用指标体系评价与聚类方法相结合[17－21]以及社会经济数据划分[22]、空间分析法[23]等. 类型划分上，单因素主导类型以经济发展水平[24－26]、产业结构分类[19－20]；多因素主导多以产业结构、地形地貌特征、转型特征、城乡关系等相结合划分[24－29]. 研究尺度上，主要选取省级[17]、县域级[18－23]和村级数据[20]，省级地方政府作为行使管理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以县域为单位明晰行政范围内乡村发展阶段与格局，有利于决策者制定差异化的农村发展政策、合理分配区域内各项资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针对西南地区的实例研究较少.

重庆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农村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正不断发生着转变，乡村发展类型复杂多样，农业与农村发展表现出明显的转型特征[17]. 着眼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和转型发展特征的角度，划分乡村转型综合类型，探索重庆市 2004－2015 年乡村发展与转型空间格局，归纳各转型综合区的发展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综合区的发展思路，提供相关决策参考.

---

① 收稿日期：2017－03－21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16SKGH250)；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技项目(KJ1603202).
作者简介：郑祖艺(1992－)，女，重庆江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的研究.
通信作者：廖和平，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 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时点选择及数据来源

研究时点选择为2004年、2009年、2015年. 2005年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纳入国家重大战略重心,"三农"发展逐步得到广泛关注,故选择2004年作为乡村快速发展起步的时间点. 2009年1月国务院确定重庆市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新多项统筹城乡政策措施,乡村地区得到新的发展机遇,故选择2009年为乡村发展中期评估点和统筹城乡起点. 2015年作为可获取数据的近期时间点,可对重庆市12年来乡村发展过程和结果进行对比总结.

研究所需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2005—2016年)及相关区县统计年鉴. 经整理,获得重庆市38个县级行政单元的14个社会经济数据资料. 由于重庆市渝中区城镇化率为100%,无农村地区和人口,不列入评价单元. 此外还在重庆市多个区县的乡村地域进行实地调研,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2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是我国内陆唯一直辖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沿地区,土地面积8.24万km^2,共辖渝中区等38个区(县). 重庆市地形地貌复杂,渝西以方山丘陵为主,渝东北地处大巴山及三峡库区,渝东南地处武陵山区,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等区域差异特色. 乡村发展受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基础等条件影响,在经济发展、城乡差距等方面差异明显,2015年重庆市人均GDP最高的渝中区是最低的巫溪县的7.9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南岸区是最低的巫溪县的2.3倍.

1.3 研究方法

1.3.1 乡村发展水平评价

乡村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可视为特定乡村地域系统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和谐进步、环境不断改善、文化接续传承的良性演进过程[31],乡村发展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评价乡村发展水平需要多目标的综合性指标,遵循全面性、主导性、科学性、可比性等原则,立足研究区域特征,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8-30],从农业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水平3个目标展开评价. 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城乡之间是连续的[34],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包含农村农业评价和县域整体评价的14个指标. 各项指标的权重先采用熵权法计算,再与各相关研究中特尔斐法所得权重对比,取二者均值作为各项指标的最终权重(表1). 既兼顾了数据信息间内在联系又结合了决策者主观判断,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为消除各指标不同单位和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数据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各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

表1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及单位	指标权重
农业发展水平(0.307 7)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总产值/农业从业人数/(元·人$^{-1}$)	0.089 6
	农业优势指数	(各区县农业总产值/各区县GDP)/(重庆市农业生产总值/重庆市GDP)/%	0.087 4
	粮食生产率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t·hm^{-2})	0.059 5
	化肥施用效率	农业总产值/化肥折纯使用量/(10^4元·t^{-1})	0.071 2
社会经济水平(0.293 9)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0.099 3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	地方财政预算收入/总人口数/(元·人$^{-1}$)	0.083 2
	医疗水平	医疗机构床位数/总人口数/(床·百人$^{-1}$)	0.050 2
	教育水平	在校学生数/总人口数/%	0.036 7
	信息化水平	电视覆盖率/%	0.024 5
人民生活水平(0.398 4)	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0.095 3
	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96 8
	农村用电水平	农村用电量/农业人口数/(kWh·人$^{-1}$)	0.066 9
	居民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人口数/(元·人$^{-1}$)	0.079 0
	居民储蓄水平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总人口数/(元·人$^{-1}$)	0.060 4

1.3.2　乡村发展水平划分

ArcGIS 提供的自然断裂法的断裂点在直方图山谷的最低点，按照山谷的大小分配断裂点，最大的山谷为第一个断裂点. 此方法可以使组内差距最小，组间差距最大，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分类方式[32]. 依据此方法将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从低至高划分为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水平、中等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高发展水平 5 类.

1.3.3　乡村转型类型划分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不断加快，导致了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即乡村的转型发展[34]. 乡村转型发展主要体现在农民生活和消费水平、农业土地经营方式、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与城乡差别、经济形态、空间格局与社会形态的转变[34]. 结合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及权重，从城乡关系与城乡差距角度出发选取分别代表乡村发展、城镇发展、城乡差距变化的 5 个指标，构建乡村转型类型划分指标体系(表 2). 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 2004－2009 年、2010－2015 年重庆市城乡发展变化标准化结果. 将乡村发展变化小于城镇发展变化且城乡差距增大的县域划为城市导向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的划为城镇带动转型；乡村发展变化大于城镇发展变化且城乡差距增大的县域划为乡村主导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的划为城乡协调转型(表 3).

表 2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类型划分指标体系

目标层	指标层	计　算　方　法
乡村发展变化	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率	(末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初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初期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民收入水平变化率	(末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初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初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城镇发展变化	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率	(末期人均 GDP－初期人均 GDP)/初期人均 GDP
	地方财政水平变化率	(末期人均财政预算收入－初期人均财政预算收入)/初期人均财政预算收入
城乡差距变化	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率	(初期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末期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末期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比

表 3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类型划分特征

县域乡村转型类型	城乡发展变化速率	城乡差距
城市导向转型	城镇发展变化大于乡村发展变化	增大
城镇带动转型	城镇发展变化大于乡村发展变化	缩小
乡村主导转型	城镇发展变化小于乡村发展变化	增大
城乡协调转型	城镇发展变化小于乡村发展变化	缩小

1.3.4　乡村综合类型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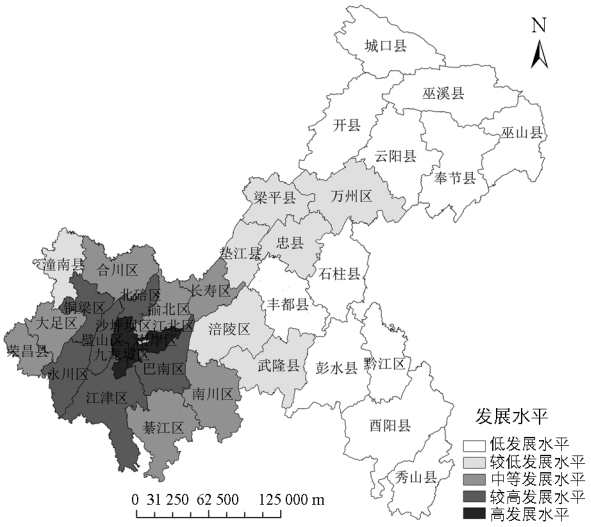
乡村转型发展是动态的，乡村发展水平是上一阶段转型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下一阶段转型的基础. 将县域乡村发展水平和转型发展类型评价结果作为乡村综合类型的划分依据，可明确研究时间段内乡村发展的动态变化及城乡关系转变情况. 采用 SPSS 19.0 中的 Hierarchical Cluster 对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转型发展类型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得到乡村综合类型划分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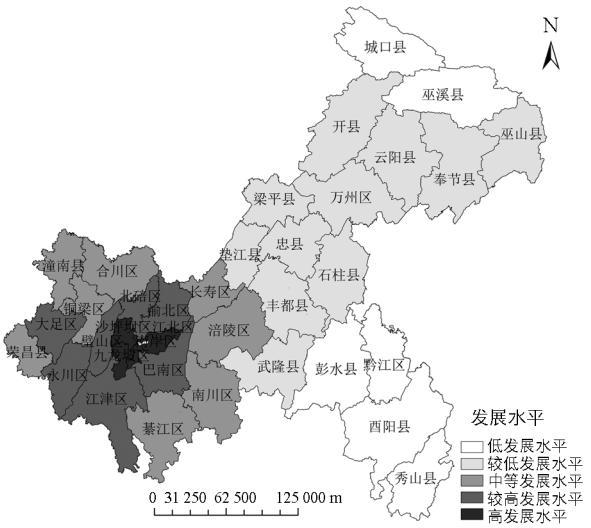
2.1　重庆市乡村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与特征

重庆市各区县 2004 年、2009 年、2015 年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见表 4，时空特征如图 1. 可以看出，重庆市乡村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由都市圈向“两翼”丘陵山区逐步降低. 总体上，都市圈凭借其城镇地区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良好的交通、区位优势对县域内乡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乡村发展水平较高，评价结果基本在 0.5 以上. 因城镇发展速度远超乡村地区，乡村发展水平评价值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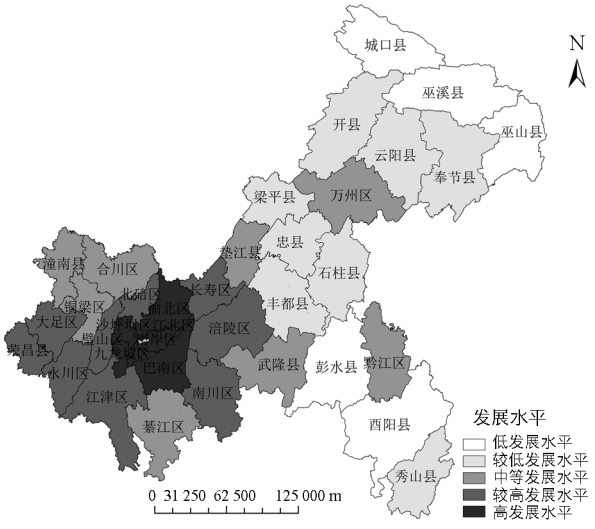
时间增长反而略有降低. 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地区因自然资源条件、区位、交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等因素城乡发展均受限，水平较低，随着对乡村地区各项要素投入加大和各项统筹城乡改革措施的实施，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高.



(a)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2004年)



(b)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2009年)



(c)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2015年)

图 1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2004－2009 年(图 1a，图 1b)重庆主城 5 区保持高发展水平，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区县中，渝北、大足、涪陵区社会经济水平各项指标增长迅速，经济和地方财政能力的增长是临近都市圈县域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动力；潼南县、丰都县、奉节县等社会经济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幅均较大，农业对其乡村发展有重要的推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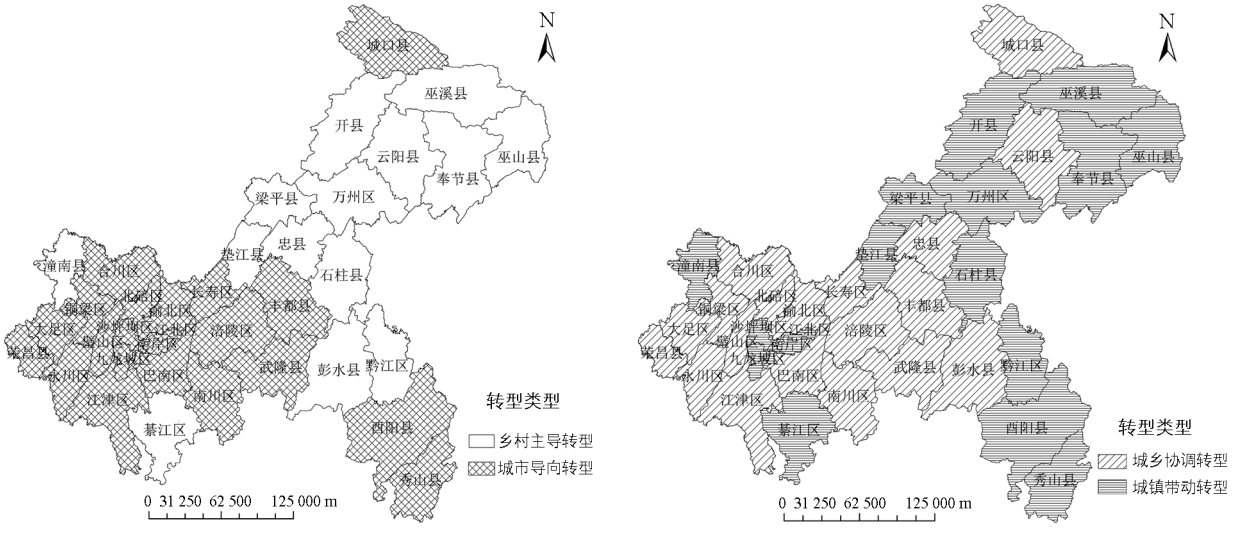
随着农业和农村问题纳入国家重大战略中心和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确立，2009 年以来各地区更加关注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同时城乡统筹试点、新农村建设等政策的出台大力促进了乡村产业结构转型、改善了农民的生活，重庆市总体水平得到提升. 都市区外围县域，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环境下，乡村发展水平提升更为迅速. 万州、黔江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发展战略的确立逐步成为渝东北、渝东南的发展中心，乡村发展进入中等水平. 最终形成以主城 9 区为核心的都市圈和以万州区、黔江区为带动点的两翼地区乡村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的格局(图 1c). 城口、巫溪、酉阳县等由于地形限制、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和周边地区拉动作用不强等原因仍发展缓慢，水平较低.

表 4　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行政区	2004 年（评价结果）	2009 年（评价结果）	2015 年（评价结果）	行政区	2004 年（评价结果）	2009 年（评价结果）	2015 年（评价结果）
沙坪坝区	0.686 5(高)	0.568 8(高)	0.544 7(高)	潼南县	0.269 4(较低)	0.311 6(中等)	0.342 6(中等)
南岸区	0.669 3(高)	0.584 0(高)	0.571 3(高)	梁平县	0.263 8(较低)	0.259 8(较低)	0.277 3(较低)
九龙坡区	0.628 5(高)	0.611 0(高)	0.580 9(高)	垫江县	0.256 1(较低)	0.270 4(较低)	0.309 4(中等)
江北区	0.610 8(高)	0.613 1(高)	0.578 3(高)	武隆县	0.255 2(较低)	0.237 6(较低)	0.319 2(中等)
大渡口区	0.608 5(高)	0.544 8(高)	0.483 6(高)	万州区	0.245 5(较低)	0.283 4(较低)	0.351 6(中等)
永川区	0.424 6(较高)	0.425 7(较高)	0.409 7(较高)	忠县	0.232 0(较低)	0.285 4(较低)	0.296 2(较低)
北碚区	0.405 2(较高)	0.430 5(较高)	0.417 6(较高)	开县	0.212 9(低)	0.243 7(较低)	0.264 6(较低)
江津区	0.401 1(较高)	0.440 2(较高)	0.385 5(较高)	云阳县	0.189 5(低)	0.231 7(较低)	0.273 8(较低)
巴南区	0.397 9(较高)	0.460 2(较高)	0.467 7(高)	彭水县	0.187 5(低)	0.188 1(低)	0.238 6(低)
铜梁区	0.383 4(较高)	0.385 0(中等)	0.340 6(中等)	奉节县	0.187 2(低)	0.244 0(较低)	0.270 2(较低)
璧山区	0.371 4(较高)	0.411 7(较高)	0.387 0(较高)	秀山县	0.185 7(低)	0.143 0(低)	0.280 2(较低)
渝北区	0.353 9(中等)	0.408 2(较高)	0.484 6(高)	丰都县	0.185 7(低)	0.256 0(较低)	0.296 1(较低)
南川区	0.347 8(中等)	0.360 7(中等)	0.380 8(较高)	黔江区	0.183 6(低)	0.198 1(低)	0.326 0(中等)
合川区	0.345 1(中等)	0.389 6(中等)	0.323 7(中等)	石柱县	0.175 0(低)	0.227 3(较低)	0.304 1(较低)
綦江区	0.342 2(中等)	0.368 8(中等)	0.324 0(中等)	巫山县	0.164 8(低)	0.219 1(较低)	0.257 7(低)
荣昌县	0.322 9(中等)	0.380 1(中等)	0.399 5(较高)	巫溪县	0.160 4(低)	0.180 1(低)	0.212 6(低)
大足区	0.321 9(中等)	0.431 9(较高)	0.410 2(较高)	酉阳县	0.159 4(低)	0.176 3(低)	0.252 8(低)
长寿区	0.308 8(中等)	0.360 7(中等)	0.383 9(较高)	城口县	0.154 5(低)	0.188 1(低)	0.228 4(低)
涪陵区	0.286 0(较低)	0.331 2(中等)	0.386 9(较高)				

2.2　重庆市乡村转型类型时空格局与特征

受重庆市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发展势头强劲，2004－2009 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均呈拉大趋势，乡村转型发展表现为乡村主导转型和城市导向转型两类. 转型发展格局表现为都市区中心及其辐射“一小时经济圈”的城市导向转型和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山区的乡村主导转型(图 2a). 其中城口、酉阳、秀山县乡村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城市推动力相对较大，因此表现为城市导向转型.



(a) 重庆市各县域乡村转型类型(2004-2009年)　　(b) 重庆市各县域乡村转型类型(2010-2015年)

图 2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类型时空差异

2009年以来，重庆市在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政策环境和地方政府城乡发展观念的转变，导致乡村产业结构、农民生活生产方式都发生了较大转变，乡村发展加快，促进了乡村的转型. 2010－2015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态势，城乡矛盾逐渐缓和，乡村转型发展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和城镇带动转型. 转型发展格局基本呈现出：由都市核心区向外延伸的“城镇带动－城乡协调－城镇带动转型”交错圈层结构(图2b). 其中云阳和城口县由于城乡发展均缓慢，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

2.3 重庆市乡村转型综合类型特征、格局及建议

根据聚类结果将重庆市乡村转型综合类型划分为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I)、高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II)、发展中以城带乡转型区(III)、发展中城乡协调转型区(IV)、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V)、低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VI)6类(表5). 总体上，各类型区面积分别占重庆市总面积的1.72%，16.31%，17.86%，18.52%，29.80%和15.79%；其中，18.03%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较高、36.38%区域乡村发展迅速、45.59%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较低；49.38%区域表现为以城带乡转型、50.62%区域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 可见，第一，重庆市较大面积表现为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只在都市核心区，面积占比极小，两极化较严重；第二，重庆市总体乡村发展差异明显，近年来虽发展较为迅速，大部分区域乡村发展仍困难重重；第三，重庆市以城带乡和城乡协调两种转型类型面积基本持平，可见城乡统筹等措施在重庆已初见成效，乡村自身发展动力得到增长.

表5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综合类型特征

类型区	行政区	总面积/km^2	乡村发展速度	乡村发展水平			乡村转型发展类型	
				2004	2009	2015	2004－2009	2010－2015
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I	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	1 413.27	平稳	0.605－0.690	0.540－0.625	0.480－0.585	城市导向转型	城镇带动转型
高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II	巴南区、渝北区、北碚区、璧山区、江津区、永川区、合川区、铜梁区	13 435.83	平稳	0.345－0.425	0.385－0.465	0.320－0.485	城市导向转型	城乡协调转型
发展中以城带乡转型区III	潼南县、綦江区、垫江县、石柱县、黔江区、万州区	14 713.36	迅速	0.175－0.345	0.195－0.370	0.300－0.355	乡村主导转型	城镇带动转型
发展中城乡协调转型区IV	大足区、荣昌县、长寿区、南川区、涪陵区、丰都县、武隆县	15 258.03	迅速	0.185－0.350	0.255－0.435	0.295－0.415	城市导向转型	城乡协调转型
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V	梁平县、酉阳县、秀山县、开县、奉节县、巫溪县、巫山县	24 551.94	缓慢	0.155－0.265	0.140－0.260	0.210－0.285	乡村主导转型/城市导向转型	城镇带动转型
低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VI	彭水县、云阳县、城口县、忠县	13 004.67	缓慢	0.150－0.235	0.185－0.290	0.225－0.300	乡村主导转型/城市导向转型	城乡协调转型

6大类型区在重庆市的空间格局如图3，转型类型区呈现出一定分异规律，转型类型呈现都市圈向外延伸的3圈层结构：第一层为都市区核心区以城带乡转型区，第二层为都市区外围拓展县域城乡协调转型区，第三层为“两翼”边缘区域以城带乡转型区. 每个类型区应根据其特征，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以促进县域内城乡协调健康发展.

I区位于重庆都市核心发展地带，该类型区内城镇经济社会基础雄厚，高端要素集聚，辐射作用强，对县域内乡村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力. 由于距都市区较近，区位、交通优势良好，其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优先接受到城市资本，在城市扩张中其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结构、农民生活方式等逐渐向城市转型. 未来应优化非农建设用地的配置，注重生态空间格局的构建，成为城市有序健康扩张的重要保障.

II区位于重庆都市核心及拓展区域，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及城乡统筹的逐步推进，农村人口稳步向城镇转移，在城镇发展的同时关注乡村建设，形成城乡协调式的乡村转型. 未来应利用紧临都市区的优势，结合城市周边耕地保护，以政府和村集体为主导，有序推进农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保障交通等各项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乡村旅游项目，持续加快县域社会经济发展.

III 区位于重庆市都市拓展区外围和两翼核心地区，是三峡库区移民的主要接受区县. 评价初期社会经济基础较弱，县域内城市地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表现为乡村主导转型. 评价后期政府对城镇的建设投入、农业人口转移等使其发展迅速，对乡村的推动作用逐渐明显，表现为以城带乡转型. 未来应加大对乡村的投入，注重三峡移民后续发展连片贫困区扶贫的开展，同时对农用地进行调控，设立农业生态产业园区，实现农用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农用地利用效益，增加乡村自身发展转型动力.

IV 区位于重庆市都市拓展区外围，重庆市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其发展迅速，工业化和“退二进三”等因素使其城市发展推动力作用较强，评价初期表现为城市导向转型，后期因城乡统筹试点等政策的推行，乡村自身发展动力逐渐增强，表现为城乡协调转型. 未来应在保障生态功能的同时，建设组团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产业集聚区，对乡村地区通过土地整治、农用地整理、引进农业企业等方式进行农用地流转，建设特色资源加工基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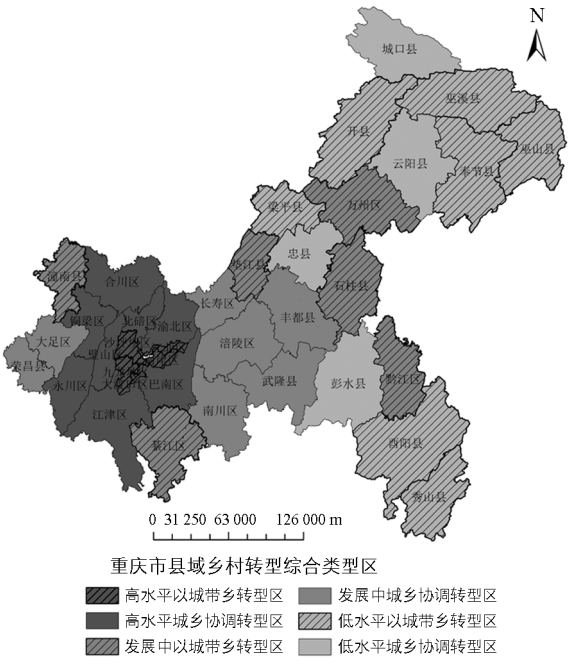


图 3　重庆市县域乡村转型发展综合类型

V 区位于重庆市两翼边缘地区，森林和水等资源丰富，受地形地貌限制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困难，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较差，乡村人口分散，劳动力大多已转移到城镇，乡村自身发展条件不佳. 未来应突出保护生态为首要任务，划定生态红线，注重三峡库区水源涵养，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有力推进扶贫工作的开展，努力建设为重庆市乃至西南片区的重要生态屏障.

VI 区位于重庆市两翼中部地区，由于乡村和城市均发展缓慢，城乡发展速度差异小，城乡关系相对缓和，表现为发展水平较低的城乡协调转型. 未来应做好县域发展功能分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生态红线区内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发展生态经济，提高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

3　结论与讨论

第一，由于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重庆市县域乡村发展水平高低不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确立，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与交互作用不断加快，导致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重构[19]. 以县域行政单元为评价尺度，从农业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 3 个方面来评价乡村发展水平，将其从高到低划分为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水平、中等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高发展水平 5 类. 从乡村发展、城镇发展、城乡差距的变化，将乡村转型发展划分为城镇导向转型、城镇带动转型、城乡协调转型、乡村主导转型 4 类，刻画出 2004－2015 年重庆市乡村发展转型过程和时空格局演变，符合我国乡村发展的实际，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运用系统聚类法，以乡村发展水平与乡村转型类型结果为依据，将重庆市划分为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高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发展中以城带乡转型区、发展中城乡协调转型区、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区、低水平城乡协调转型区 6 类乡村综合转型区. 重庆市各类型区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 1.72%，16.31%，17.86%，18.52%，29.80%和 15.79%. 总体乡村发展差异明显，两极化较严重，较大面积表现为低水平以城带乡转型，极小面积为高水平以城带乡转型，但城乡统筹等措施已初见成效，乡村自身发展动力得到明显增长.

第三，由于社会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和城乡互动差异，乡村转型发展综合类型区呈现出一定空间分异

规律：乡村发展水平由都市区至“两翼”地区逐步降低，都市区外围区县发展迅速，但大面积乡村发展水平仍较低，发展任重而道远；转型类型呈现出由都市圈向外的3个圈层结构，即第一层为都市区核心区域以城带乡转型区，第二层为都市区外围拓展县域城乡协调转型区，第三层为“两翼”边缘区域以城带乡转型区.在城镇发展迅速的环境下，乡村自身发展动力成为乡村转型类型和城乡互动关系中的主要决定要素.

本文从城、乡两方面的转变入手，分析重庆市2004－2015年的乡村转型发展状态和其分别所处转型阶段的分异格局，为不同类型和转型阶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研究基础.并针对其不同转型路径，提出未来发展宜采取的措施建议，为各级政府决策者提供意见参考.但本文以宏观视角，选取县域经济社会数据作为评价指标，介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对各类型区内部城乡转型机理研究不够，还需收集更多城乡要素互动的指标数据，对重庆市乡村转型发展的驱动机制等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将是以后继续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刘彦随.中国新农村建设地理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75－180.
[2] 乔家君.中国乡村地域经济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28－132.
[3] 刘彦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J].地理学报，2007，62(6)：563－570.
[4] 龙花楼.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2)：131－138.
[5] 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黄淮海典型地区村域转型发展的特征与机理[J].地理学报，2012，67(6)：771－782.
[6] 李婷婷，龙花楼.基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的乡村转型发展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5，35(10)：149－155.
[7] 王子侨，石翠萍，蒋 维，等.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视角下的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以长武县洪家镇为例[J].地理研究，2016，35(8)：1510－1524.
[8] 李婷婷，龙花楼.基于转型与协调视角的乡村发展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4，33(4)：531－541.
[9] 龙花楼，李婷婷，邹 健.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12)：2080－2085.
[10] 李红波，张小林，吴启焰，等.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理研究——以苏南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5，30(4)：591－603.
[11] 程 哲，蔡建明，崔 莉，等.乡村转型发展产业驱动机制：以盘锦乡村旅游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37(1)：143－150.
[12] 王艳飞，刘彦随，李玉恒.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J].经济地理，2016，36(5)：135－142.
[13] 杨 忍，徐 茜，李璐婷.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6，35(12)：2261－2272.
[14] 杨 忍，刘彦随，龙花楼，等.基于格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及空间指向性的地理要素识别——以环渤海地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5，34(6)：1077－1087.
[15] 唐林楠，刘 玉，唐秀美.北京市城乡转型与乡村地域功能的时序特征及其关联性[J].人文地理，2016，31(6)：123－129.
[16] 王艳飞，刘彦随，李玉恒.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J].经济地理，2016，36(5)：135－142.
[17] 龙花楼，邹 健，李婷婷，等.乡村转型发展特征评价及地域类型划分——以“苏南—陕北”样带为例[J].地理研究，2012，31(3)：495－506.
[18] 孟欢欢，李同昇，于正松，等.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3，33(4)：144－148，185.
[19] 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J].地理研究，2011，30(9)：1637－1647.
[20] 姚 龙，刘玉亭.基于聚类分析的城郊地区乡村发展类型——以广州市从化区为例[J].热带地理，2015，35(3)：427－436.
[21] 程叶青.东北地区农业地域结构类型划分研究[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9，25(1)：54－58.
[22] 龙花楼，刘彦随，邹 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J].地理学报，2009，64(4)：426－434.
[23] 马晓冬，李全林，沈 一.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地理学报，2012，67(4)：516－525.
[24] 张继忠，聂宏声，王学萌，等.山西省农村经济类型分类的数量化研究[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1987，3(1)：17－23，38.

[25] 张步艰. 浙江省农村经济类型区划分 [J]. 经济地理，1990，10(2)：18－22.
[26] 崔　明，覃志豪，唐　冲，等. 我国新农村建设类型划分与模式研究 [J]. 城市规划，2006，30(12)：27－32.
[27] 姚建衢. 农业地域类型划分的聚类分析 [J]. 地理科学，1998，8(2)：146－155，199.
[28] 吴传钧. 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 [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143－156.
[29] 刘彦随，冯德显. 陕北绥德县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评价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9(1)：85－89，100.
[30] ALI A M S. Population Pressural，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and Changes in Rural Systems in Bangladesh [J]. Geoforum，2007，38(4)：720－738.
[31] 姚　龙，刘玉亭. 乡村发展类型与模式研究评述 [J]. 南方建筑，2014(2)：44－50.
[32]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 [J]. 地理学报，1998，53(4)：365－371.
[33] 杨国良，张　捷，刘　波，等. 旅游景区分布约束下的四川旅游流齐夫(Zipf)结构发育特征 [J]. 旅游学刊，2007，22(8)：17－23.
[34] 龙花楼. 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68－81.

On Type Division and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Areas in Chongqing

——Based on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Transition Assessment

ZHENG Zu-yi[1]，　LIAO He-ping[1,2]，　YANG　Wei[3]，　ZHAO Zhen-yang[1]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2. *Insitute of Land Resourc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3. *School of Geology and Geometory Engineering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Chongqing 400037，China*

Abstract：Promot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a significant long-term strategy to achieve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t is helpful to propose policies for a diverse development for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rural development levels and transition assessment.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utilize the methods of natural breaks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to investigate what development stage the rural areas of Chongqing are in，to divide them into different development types and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2004－2015. The rural areas of Chongqing are then clustered into six comprehensive rural transition zon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2004－2015 there was an apparent regional difference in the general rural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 and a severe polarization existed. Nevertheless，measures such 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so that it presented an obvious increase in the driving force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transition zones showed a distinc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presented a decreasing tendency from the central urban area to the "two wings" area，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s peripheral suburbs was prominent；the transition style showed a layered structure along the urban-rural area lines which was basically from town-driving-country transition zones to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ransition zones，finally to the town-driving-country transition zon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 paths of the different typical zones，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about their development.

Key words：rural development level；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type division；spatial pattern；Chongqing

责任编辑　周仁惠